

转型期共享资源 合作治理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Comm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宋妍 / 著

合作治理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特别感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0326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5M580484）

转型期共享资源 合作治理

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Common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宋妍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期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 宋妍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 7 - 5141 - 6686 - 6

I. ①转… II. ①宋… III. ①经济转型期 - 资源共享 - 研究 IV. ①F06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3283 号

责任编辑: 段 钢

责任校对: 王苗苗

责任印制: 邱 天

转型期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宋 妍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4 印张 220000 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686 - 6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从财力负担的义务和管理责任来看，基本背景就是计划体系的低效率致使政府的财力包袱不堪重负。持续推进的改革趋势是不断减轻政府的财力包袱，向基层决策单元——城乡家庭和企业——分解下放决策的责任和资源供给的义务。

通俗的表述就是，改革开放前由政府包揽了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服务和产品供给的义务及相应的治理责任。随着政府供给退出，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的改革对那些“可分割”呈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领域来说是平稳的。但是在涉及诸多个体共有、共用、共享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服务领域时，治理问题却并未解决，即向基层决策单元——城乡家庭和企业——分解下放决策责任和资源供给义务的治理转型并未完成。据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近年来做的“两会热点话题”调查，数据显示“两会时公众最关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问题”；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公众展开问卷调查，结果仍显示，房价、住房改革等民生问题是近年来百姓最关心的焦点问题。

简言之，不可分割的共享资源由政府统包向市场转变，

治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市场失灵；但减轻政府的财力包袱，向基层决策单元分解下放决策的责任和资源供给的义务，又是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因为政府失灵。于是，人们关注是否存在既非市场又非政府的共享资源供给及治理模式呢？来自实践的答案是肯定的，大量工作表明，存在非政府非市场的、摆脱“公地悲剧”的自主治理可能性。引致的疑问是，政府供给退出之后，发生这种可能——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条件及过程究竟如何？围绕共享资源的合作行动发生与否取决于诸个体的决策行为模式。所以有必要研究：如何从决策行为模式调整的层面，探讨转型期政府供给退出后的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

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共享资源治理方式中的决策责任和资源供给义务发生变化，是否能变为合作治理，取决于各参与方的决策行为模式调整，即能否从原先习惯的政府包揽的决策行为模式，调整为适应自主合作治理的决策行为模式。由此考虑，本书要研究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转型期个体决策行为模式调整；二是共享资源自主合作治理模式的发生条件。

（1）转型期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的发生条件。

作为公共管理重要内容的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的发生条件如何，或者说达成合作治理的内生条件是什么，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针对中国处于转型期政府供给退出这一特征，本书侧重潜在合作者关于决策行动规则共同知识的条件，或者说不依赖完全理性、完美信息子博弈精炼解的行动规则及策略信念，包括个体间权利义务认知的异质性、交往频率、互动关联方式等关键因素对合作均衡的影响。

(2) 转型期个体决策行为模式调整机理探查。

尝试探索回答：个体从依赖政府供给的初始认知状态开始，通过经历的行动和支付，信念和行为模式的动态调整方式如何？诸如策略思维（Strategic Thinking）、虚拟博弈（Fictitious Play）的最佳响应（Best-response）、强化调整、老练学习（Calibrated Learning）、复制大多数的模仿者动态等，哪一类行为调整方式最能拟合转型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式调整？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进一步可以揭示个体决策行为模式调整对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安排的作用。

研究认为，共享资源是一定范围内群体成员敞开使用、趋于减少且不可分割的重要经济资源，其治理模式和治理效率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由群体成员合作供给共享资源是转型期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的合理选择与创新。依据“制度发育是多个体决策行为互动的产物”的理论思路，以转型期决策场景为背景，以个体决策行为调整为基点，考察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发育的条件和机理。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模式作为一类制度，其产生的条件在于参与个体形成关于合作供给共享资源的共同知识和策略共识。基于个体交往的认知调整和策略学习，局部策略行为通过碰撞、扩散、收敛形成共同的策略认知，进而促成共享资源自发合作治理制度发育。城市社区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农村公共水资源联合供给和自愿环境协议达成的具体案例表明，基于支付强化和信念学习的策略调整有助于增强供给策略对个体的吸引度，增大个体选择自发供给策略的概率，同时也能提高个体的平均支付和联合支付水平，基本上能够克服共享资源供给上的“囚徒困境”，使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的发育和

维持成为可能。

研究意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管理科学的微观基础理论属于经验学科，是直接面对决策行为主体的。尽管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层面上、在组织间的关联结构层面上吸引了大量的研究力量，但作为选择或者说决策行为的基本单元还是个体，个体作为规则共同知识的载体，通过其互动行为反映出系统层面的特征。古典的、行为学派的、以西蒙（Simon）为代表的 Carnegie Mellon 学派以及近年来“社会人”的基点，都是围绕个体基本假设的经验和理论的研究。所以决策行为主体的考察，是这一学科最基础的问题之一。

本书从个体关于决策规则的共同知识——决策行为模式的演变出发，考察社会转型下的个体对政府科层体系供给和治理共享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的转变、探索“搭便车”（卸责）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主动学习、合作的创造性行为发生与规则动态调整机制。这种基于个体决策行为模式演变的探索，可以为公共管理理论、为决策及认知行为研究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联系等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对经验现实的拟合检验，尝试发现个体行为模式调整机理，有助于揭示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安排发生的可能性及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转型期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管理，尤其是人居环境改善的投入、维护、利用机制，是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书研究结论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服务提供者，面对面广、量大的人居环境建设，并非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而是需要培养公民的自理能力和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使之自发完成共享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和创新，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获得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作者

2016年1月

目 录

第1章 绪论：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转型期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1
1.1 共享资源的治理模式····	2
1.2 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制度均衡····	7
1.2.1 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7
1.2.2 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发育和调整的 均衡条件····	11
1.2.3 引入个体决策行为模式调整与学习模型的 制度均衡····	13
1.3 核心概念界定：转型期、认知调整与共享 资源合作治理····	16
1.3.1 转型期····	16
1.3.2 认知调整····	18
1.3.3 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20
1.4 内容与结构安排····	23
第2章 协调与冲突：转型期共享资源制度安排的发生机理····	25
2.1 个体间交往模式····	26
2.1.1 内在的个体间交往模式····	26
2.1.2 个体间交往模式的均衡····	35

2.2	协调失灵与集体选择的困境	42
2.2.1	协调问题的分类	42
2.2.2	异质性对协调失灵问题的影响	45
2.2.3	退出权和惩罚机制对协调失灵问题的影响	52
2.3	利益冲突与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制度生发的分析路径	60
2.3.1	利益冲突的程度	60
2.3.2	从进化理性到心智模型	62
2.3.3	知识运用、认知调整与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扩展秩序	74
第3章	竞争与合作：转型期共享资源制度安排的演化均衡	87
3.1	制度演化的一般分析框架	89
3.1.1	制度的自发演化	89
3.1.2	维系制度自发演化的个体行为驱动	92
3.1.3	构建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制度分析框架	98
3.2	制度演化的认知机制	108
3.3	同质认知个体群的制度演化问题	110
3.3.1	同质认知个体群制度演化的特征	110
3.3.2	模型分析	111
3.3.3	均衡讨论	113
3.4	异质认知个体群的制度演化问题	115
3.4.1	异质认知个体群制度演化的特征	115
3.4.2	模型分析	116
3.4.3	均衡讨论	119
3.5	转型期多样性制度并存与变迁的认知解释	122
第4章	变迁：中国转型期个体认知调整与共享资源合作治理创新	135
4.1	转型期中国个体认知调整与制度变迁研究	136

4.1.1	制度变迁的经典分析架构	136
4.1.2	基于个体分散决策的自发演化型变迁	139
4.1.3	转型期中国社会个体认知调整与交往模式的 演变	142
4.2	案例分析	158
4.2.1	案例一：城市社区共享资源合作治理习俗的演化 博弈分析	158
4.2.2	案例二：农村合作组织与公共水资源联合供给的 集体行动问题	166
4.2.3	案例三：自愿环境协议的经济学分析	179
第5章 结束语		191
参考文献		195
后记		209

转型期共享资源
合作治理

Chapter 1

第1章 绪论：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转型期 共享资源合作治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从我国改革前后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经验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于是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是怎么作用于经济的，成为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使命。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科斯（Coase）、诺斯（North）、阿尔钦（Alchain）、德姆塞茨（Demsetz）、威廉姆森（Willimson）和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越来越多地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研究。然而，发达国家本身的制度已经相对成熟、稳定，少有值得研究的大的制度变迁。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来研究，对于生活、工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说，则又受到文化、历史知识的局限，不易把握问题的实质。所以制度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贯的制度结构如何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演进的研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重要领域。

共享资源治理的制度研究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Ostrom, 2009），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公共经济学理论取得进展，还促进了世界各国在有关共享资源政策方面的显著改善。但是，其中结合转型期共享资源治理方式中各参与方决策责任和资源供给义务发生变化，个体决策行为与共享资源制度安排如何实现共生演化的难题始终悬而未决。为此，本章主要从共享资源治理模式和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制度均衡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之后对涉及的关键词和术语进行一番界定和交代，以免发生误读和混淆。当然，界定和交代是简要的，具体的含义以及如何应用于共享资源治理的制度分析在其后章节中会做详细的解释。

1.1 共享资源的治理模式

从教科书到现实政策主张，以马歇尔（Marshall）、庇古（Pigou）、

萨缪尔森 (Samuelson) 和阿罗 (Arrow) 为代表的经典传统, 一直主张围绕并超越个体的“公共需要”。例如, 庇古的“边际社会纯产品”、社会福利函数; 萨缪尔森对共享资源数量的非排他性表述 (个体需求沿价格坐标的纵向累加)、均衡条件表达式。尽管整个规范性价值目标的基准是抽象的公共需要, 但他们对共享资源的功能把握也注意到了公共产出和分配将对“个体效用”产生影响, 这集中表现为产出效率是以个体效用为基础进行“合成”的。由于采用的是一般形式化模型的处理方法, 他们的论述对分析描述共享资源的模型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一类与此形成对比的就是代表并坚持以“个体效用”为基准的理论思路。这包括边际效用理论、维克塞尔—林达尔 (Wicksell-Lindahl) 均衡 (自愿交换理论) (维克塞尔, 1997)、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Buchanan, 1965)、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 (Olson, 1965) 以及奥斯特罗姆关注的集体行动制度演化解 (Ostrom, 1990)。他们的工作一方面在规范意义上主张个体选择 (参与) 和效用评价; 另一方面在经验观察和解释意义上强调了个体行为假设及场景条件的重要性。因此, 在他们的模型和方法中, 都不会用圣人 (完人) 来代表各个局部的当事人进行决策, 也不会用圣人来塑造某个决策角色。这为我们构建共享资源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

以个体效用为基础讨论共享资源问题可以追溯到边沁 (Bentham) 的“效用理论”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 2000)。他以个体为分析基点, 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利益的汇总, 共享资源的价值依赖于私人评价, 政府对共享资源的配置也应该依据私人对商品的需要。根据这种由个人需求决定价值的理论, 区分提供者是私人还是政府, 已不影响消费者的价值判断, 只要物品或服务为消费者所需要, 为消费者提供了效用, 就不管是由公共提供, 还是由私人提供。到了1883年, 萨克斯 (Sax) 把“边际效用”概念运用到公共财政上, 认为把国家范围的共享资源与个体以消费者身份所作的效用评价相联

系,使政府活动被赋予了提供国家范围之共享资源的意义,并在国家范围的共享资源提供与个人纳税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为政府提供共享资源提供了经济学形式上的“证明”^①。

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被经济学教科书广泛引用,是把边际效用价值论运用到公共税收和共享资源产出问题上最基础的一项成果。关于公共税收的利益原则,可以概括为:人们如果以自愿交易为基础来对共享资源缴纳税金,那么赋税就符合自愿交换的原则,当然从规范意义上应该要求政府符合该原则^②。显然,这种把个体为政府供给的产品和服务所支付的税价与对它们的评价相联系,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直接的评价进行“讨价还价”而产生的“税价”就是共享资源供给由“内在发生”的演化均衡状态了。

遗憾的是,导致全体“一致同意”的条件是困难的。正如奥尔森在探讨团体提供集体利益的种类与数量时指出,这是一个“罕见的状态”,因为每个个体首先要参与“讨价还价”活动,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自愿同意成本分摊的安排及产品的数量。因此,在规范意义上,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显然成为一种理想的建构,从对现实提供经验解释的模型要求来看,具有相当的距离。但通过借鉴边沁的效用评价方法,突出共享资源的决策程序,关注“讨价还价”动态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为后来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

布坎南对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进行了延续和发展。在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分散的个人偏好结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被作为焦点,强调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可以理解为共享资源制度安排)的看法,“公共选择把政治解释为选民和代理人之间在寻求增进或表达他们自己利益时的相互作用”。他特别把民主政治活动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① 这一工作使对征税的讨论和市场分析的基本假定及方法之间建立了共同“语词”,并能引出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

② 这与庇古采用效用方法认识税收在规范倾向上几乎是等价的。

这种对过程的关注明显不同于萨缪尔森、阿罗等人对最优结果的关注^①，是最符合（接近）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一致同意”的根本性的规则建议。

除了围绕中央财政的全民公共选择问题外，布坎南还讨论了“俱乐部经济理论”，即围绕地方财政公共选择的“用脚投票”理论。在简化的同质个体构成的俱乐部模型中，个体按照自己的最大效用选择结社或退出不同的俱乐部。最优解的存在，说明在市场失灵的俱乐部物品供给中不需要政府干预也可以实现配置效率。这对共享资源经验研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采用了规则（制度安排）分层的描述方式来解释制度变迁；二是描述俱乐部物品的“拥挤”特征处理方式、个人预算约束和共享资源营运水平及投入的关系简化为此类共享资源状态下的行为建立了出色简化，个体能否退出、自己是否有可能组成俱乐部，也是考察个体选择行为时必须注意的要点。

与注意公共决策的目标、准则和程序等规范性问题相比，针对个体在共享资源事物中的行为，专门进行的经验观察和解释工作甚为缺乏。奥尔森面对当代现实，关注集体行动进行的大量观察归纳和具体解释工作，为个体是否采取共享资源的供给和（或）维持的行动，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经验性观察和解释。以个人效用评价为准绳的个体，清楚自己为共享资源贡献的成本和自己从中收益的大小，据此进行收益—成本分析，从而决定行为策略。决定某个个体是否出钱出力的收益—成本，与两个主要解释变量有关：个体分属的集团规模（Group Size）大小，不同个体本身对收益评价的差异，或者说集团内的对称程度（Group Symmetries）。归纳经验观察后，奥尔森构造了假设并努力证明两个逻辑结论和一个重要推论^②。两个逻辑结论是：集

① 萨缪尔森、阿罗等人将全社会（国家）拟人化地作为一个整体，为这个整体的最优结果（共享资源的产出量和个体负担）出谋划策。

② 整个逻辑的关键是个体获得的收益占共享总量的份额比例（the Fraction），是以份额比例而不是以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来推导的。

团规模越大、集团内个体收益评价越对称，“搭便车”就越严重；集团规模越小、集团内个体收益评价越不对称，越容易出现某些个体采取集体行动，或者说，集团人数少、成员之间差异大，易于发生集体行动。一个副产品推论是：如果有了“选择性激励”，即使是大集团也能实现集体行动。

在奥尔森以个体效用评价为起点给出采取集体行动的条件后，奥斯特罗姆从复杂的现实场景中抽象出理论变量，描述了集体行动制度的演化过程。在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她围绕物品的物理特性、社群的属性和社群本身的制度性实践规则给出了资源管理、发展与治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分析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共享资源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此相得益彰的是，麦金尼斯（McGinnis，2000）在《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中也着眼于现实场景的考察，主要从制度能力角度分析了影响共享资源合作治理的因素与演变过程。

在考察制度变迁发生与否（是否会发生新规则的供给，以有利于提供和维护共享资源），奥斯特罗姆采用的是变量之间结构性的解释框架，其逻辑关系如图 1-1 所示。保留旧规则或支持新规则的策略选择结果取决于个体选择；个体选择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一方面受个体内在的自我评价规范和贴现率影响，另一方面受外部两个环境向量的影响；内在化的自我评价和贴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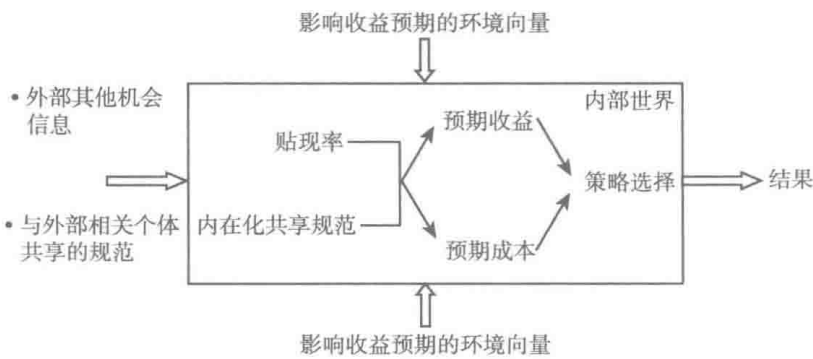


图 1-1 制度安排的发育或变迁